

妙乐寺塔景区所在地,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其西15里是上古无怀氏部落聚居地古怀城(西陶镇古城村)及殷商平皋古城;其南5里,有春秋周畿内邑隰城;北500米有汉魏晋三代河内郡府(郡政府所在地)怀县城(汉怀城);正西3里西小虹村是山海故里,西北10里西尚村是向秀故里。这片沧桑的土地,随便抓一把泥土就能捏出浓郁的文明汁液,妙乐寺塔建在这个地方,绝非偶然。

一、“怀”源上古在武陟

 武陟,古称“怀”,尽人皆知。汉字有数万个,为什么我们单单选择这个“怀”字为名,却鲜有道明。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:武陟“夏属冀州……,春秋置怀县”,从此有怀。其实不然。

 王大有《三皇五帝时代》载:传说中的上古时期,武陟一带聚居着燧人氏风姓的一个支脉——无怀氏,是大伏羲氏族一个较大的部落。部落首领姓风,名苍芒,号无怀氏,出生在无怀氏部落的政治活动中心西陶镇古城村,建有古怀城(与后述大虹桥乡土城村附近的汉怀城当别)。苍芒出生于前5278年,担任伏羲女娲政权的第七十一任帝,在位前5241—5209年,号称苍芒大帝。氏族联盟时代结束后,无怀氏部落解体,大多数族人以怀为姓,并建有怀国。西周时,怀国被周武王所征服,成为臣服于西周的诸侯国。春秋初年,怀国归郑国所有,战国时期归魏国所属。

 《管子·封禅》:“昔无怀氏封泰山。”晋陶潜《五柳先生传》:“衔觞赋诗,以乐其志。无怀氏之民欤,葛天氏之民欤!”宋罗泌《路史·禅通纪三·无怀氏》:“无怀氏,帝太昊之先。其抚世也,以道存生,以德安邦……当世之人甘其食,乐其俗,安其居而重其生。”其“帝太昊之先。”当误。

 上述表明,武陟之“怀”源于上古,至今至少有7290年的历史了。苍芒作为部落首领,以身作则,爱民如子,“以道存生,以德安邦”,治民生富庶,安居乐业。可见上古时期,我们这里就是一方养人之地,和谐之邦。

 探寻了“怀”之起源,对于理解下文就便利多了。

二、关于汉怀城

 《尚书·禹贡》中说:“覃怀底绩,至于衡漳。”南宋蔡沈注解为:“覃怀平地也,当在孟津之东,太行之西。”覃,是平旷广大的意思。“怀”字取自当时大水怀山襄陵之意。《尚书·尧典》记载,帝尧时代,“汤汤洪水方割,浩浩怀山襄陵”。蔡沈注解为:“方洪水怀山襄陵之时,而平地致功为难,故说底绩。”颜师古注解为:“覃怀,近河地名。底,致也。绩,功也。衡漳,谓漳水横流而入河。言于覃怀致功,以致衡漳。”孔颖达说:“河内郡怀县,在河之北,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,故云近河地名。”《韩诗外传》记载,武王伐纣,更名邢丘为怀。大家钱穆在《古史地理论丛·说邢》中说:“《竹书纪年》云:秦师伐邢,次于怀城,殷即足矣。然则殷之为名既久,窃疑殷城之名即起邢耳。”他认为,怀即商王祖乙时的国都。金耀华《尚书注》也说:“覃,大也,怀,地名。田皆映美,俗谓小江南。古谓覃怀,即今怀州。”

 《怀庆府志》沿革考:“怀庆府汉初属殷国,后政治河内郡,属司隶郡,治怀”。就是说,怀在汉初即为河内郡的治所。即今大虹桥土城一带。

 《怀庆府志》的依据在《汉书·地理志·河内郡》:“河内郡,高帝元年为殷国,二年更名,莽曰后队,属司隶。户二十四万一千二百四十六,口百六万七千九十七。县十八:怀,有工官。莽曰河内。汲,武德,山阳,东太行山在西北。河阳,莽曰河亭。州,共,故国。北山,淇水所出,东至黎阳入河。平皋,朝歌,封所都。周武王弟康叔所封,更名卫。莽曰雅歌。脩武,温,故国,己姓,苏忿生所封也。野王,太行山在西北。卫元君为秦所夺,自濮阳徙此。莽曰平野。获嘉,故汲之新中乡,武帝行过更名也。軹,沁水,隄寇,国水东北至信成人张甲河,过郡三,行千八百四十里。有铁官。荡阴。荡水东至内黄泽。西山,洹水所出,亦至内黄入荡。有爰里城,西伯所向也。”

 这里说的是,汉高祖二年(公元前201年)三月,汉王刘邦自临晋(今山西临猗县临晋镇)渡黄河,攻下河内,俘虜殷王司马卬,设置河内郡,其辖西至济源,东过新乡达安阳,呈新月形,长达五百余里,领十八城(县),以怀县为郡治。

 清顾祖禹《读史方輿记》载:“怀城,县西南十一里……秦师伐邢,次于怀,汉置怀县,为河内郡治”。

 《后汉书》:“河内带河为国,户口殷实,北通上党,南迫洛阳。”由于河内重要的地理位置,位置适中,交通便利,农业、手工业非常发达。汉朝曾在河内郡怀县设置工官,即专门的工业管理部门,兼有工业部和工业基地的职能。

 汉朝仍在八个郡设置工官。即:河内郡怀县、河南郡荥阳县、颍川郡阳翟县(今河南禹州市)、南阳郡宛县、济南郡东平陵县、泰山郡奉高县、广汉郡雒县、蜀郡成都县。

 可见,我县并非仅是传统的农业县,而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,就是全国八大制造业、重工业中心之一。如今县委、县政府大手笔规划建设产业集聚区、磨店新区、城北重工业区和陶瓷工业园区,就是古县新春,再铸辉煌之举。

 东汉时在怀县置建怀官,光武帝曾数次驾幸,汉章帝曾亲耕于怀。(万历《武陟志》解读218,附录覃怀考)

 建武元年(公元25年)七月己亥,光武帝刘秀亲至怀县,……,癸丑,于怀官(光武帝刘秀在怀县设置离官)祠高祖(刘邦)、太宗(刘恒)、世宗(刘彻);十月,自怀县入洛阳;建初七年(公元82年)九月甲戌,章帝刘炅巡视河内,下诏禁逢迎,务省约。元和三年(公元86年)正月,章帝刘桓亲耕于怀,命所过州县,当立春之际,不得宰杀大牲畜和砍伐林木。汉献帝初平元年(公元190年),渤海太守袁绍与河内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,屯兵于河内,曹操于扬州募兵千人,还屯河内。此间是怀县在政治上最为显赫的时期。

 魏晋时的首都洛阳,由于对南方孙吴用兵,洛阳北部的河内郡成了战略后方。“曹魏时期的河内山阳及其附近地区(如怀县)不是穷乡僻壤,而是继首都洛阳之外的第二个文化中心。”(清华大学哲学教授王晓毅语,《向秀评传》第6页)

 怀县,田皆映美,农业发达,历史上曾称为“小江南”。西晋初年,社会相对稳定,生产有所发展,被吏部尚书山涛(怀县人)聘任的怀县令潘岳(西晋文学家),曾当时怀县的风光作如下描述:“灵囿耀华果,通衢列高栢(栢是桐栢类乔木),瓜瓞绵长苞,姜芋纷广吐。稻稭肃芊芊,黍苗何离离”。“登城望郊甸,游目

妙乐寺塔泛说(上)

周小战 张德斌

 历朝寺”。可见当时怀县的城乡风光,街道宽阔,高桐夹道。农业上已经种稻、种姜,水利条件优越,沁水不仅能够灌溉农田,还可以引水入城,美化市容。

 河内郡治移至野王(今沁阳市),是西晋司马炎泰始二年(公元266年)的事,从此结束了武陟(怀县)作为河内郡治的467年历史。

 隋场帝杨广大业二年(公元606年),又改邢(古音geng)邱县为安昌县,废怀县人安昌县。这是怀县第一次撤销。到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(公元619年),安昌县改称武德县,怀县从安昌县析出复置,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(公元627年),怀县最终废入武陟,县城即降为村镇(今土城村),结束了她作为郡县治所828年的辉煌历史。

 焦作市文物志《怀县故城》:怀城,位于武陟县城西南8公里的阳城乡(今大虹桥乡)土城村周围,北靠沁河大堤,南距东张村500米,其西500米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妙乐寺塔。该城遗址尚存,南面有城门券顶,整座城东西宽800米、南北长1400米,因沁河多次决口,城大部淤于地下,仅存部分土城墙,断续可辨。此城特别是在汉代,已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要地,是汉代民间手工业特别兴盛的地区,朝廷在河内郡怀县就设有工官,制造铜钱等手工业制品,特别是光武帝多次到此城祭祀祖先,说明在怀城内建有行宫和宗庙。1964年4月3日,武陟县人民法院公布其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三、武陟是“竹林七贤”诞生地,山涛是七贤的缔造者和组织者,佛学启迪了向秀的《庄子注》

 1、山涛(205—283),字巨源,武陟人。各种史书仅称山涛为“河内怀人”,未明村里。雍正《河南志》卷四十九《陵墓·怀庆府》:晋山涛墓,在武陟县城西虹桥村,1991《武陟县志》:西晋河内怀县(今武陟县)西小虹村人。

 竹林七贤的形成过程中,山涛起了重要作用。

 山涛的老家怀县正好是河内郡的治所,也就是郡政府所在地。凭借这个地缘优势,山涛近水楼台先得月,先后做了三个地方吏员。如果山涛要填“干部履历表”,第一栏上应该写作:“河内郡主簿”,相当于郡政府办公室秘书;第二栏是“河内郡功曹”,管理一部的人事及干部任免,相当于当地的人事局长;第三栏是“河内郡上计掾”,这个职务每到年底有资格进京汇报本郡的地方财政及干部政绩情况,大体相当于审计局局长兼驻京办主任。这三个职位虽不算太高,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处级干部,却很有实权。

 《晋书·山涛传》说山涛“与嵇康、吕安善,后遇阮籍,便为竹林之游”,所谓“竹林之游”,是指约定时间游于竹林。这条史料透露的信息是起始五年三十九岁的山涛出任河内郡功曹,作为负责选拔人才的官员结交了寓居本郡的才子嵇康、吕安,后将新识的阮籍介绍给嵇康,前期竹林之游的核心由此形成。这里要明确一个地理概念。河内“郡政府所在地”不在今沁阳,而在“怀城”,即今大虹桥乡土城一带,距山涛家西小虹村3里地。否则山涛在河内郡的活动就不会那么方便。

 另据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记载:山公与嵇、阮一面,契若金兰。山妻韩氏,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,问公,公曰:“我当年可以为友者,唯此二生耳。”妻曰:“负羁之妻亦亲观狐、赵,意欲窥之,可乎?”公曰,二人来,妻劝公止之宿,具酒内。夜穿墙以视之,达旦忘反。公曰:“二人何如?”妻曰:“君才致殊不如,正当以识度相友耳。”公曰:“伊辈亦常以我为度为胜。”

 译成白话意为:山涛结识了嵇康、阮籍,三人结金兰之好。后一日清晨,阮籍醒来,觉得很郁闷,便独自驾车从洛阳郊外奔向河内郡山阳县是拜访嵇康。二人碰头后,又从山阳转奔山涛家。到达山涛家时已是下午,三人畅谈,天色渐晚。此时山涛的老婆韩氏叫下人带话给山涛,说酒肉已准备好了,一定要把二人留下来过夜。韩氏之所以要留下二人自是有原因的。自从山涛认识了嵇康、阮籍后,她就觉得老公有些冷落自己,有事没事三个人就住一起凑合,心里便念叨:“与那嵇、阮二人走得太近了罢,几个男子天天黏糊在一起,搞什么鬼?”于是,有一天睡觉前,韩氏以此事问山涛,后者回答:“在心中,被我认为才是真正朋友的,唯嵇、阮二人啊!”韩氏说:“古时候,负羁之妻曾悄悄观察过狐姬、赵姬,我也偷偷看一下你天天夸赏的这两个人,你看行吗?”山涛大笑:“有何不可?”到了晚上,韩氏透过墙上的小洞窥视嵇、阮二人,在屋子里山涛与嵇、阮通宵畅谈,韩氏则两眼看得发痴,久久不能离去,直到天亮。在送走嵇、阮后,山涛问老婆:“昨天看够了吗?这俩人如何?”韩氏说:“我觉得,你的容貌与才华,比不上他们俩。之所以跟他们成为朋友,靠的是你的见识和雅量。”山涛:“正是此话,他们二人也常说我在这方面超过他们。”

 在西小虹村山涛家的这次小聚会,实际上标志着“竹林七贤”组织的诞生。

 此文引述的史料只想说明两个观点。第一,山涛是“竹林七贤”的缔造者、组织者;第二,怀县(武陟)是“竹林七贤”诞生地。

 正始后期,山涛、阮籍、嵇康曾到首都洛阳任职,并参加了正在蓬勃发展的玄学清谈。但是,到正始八年,面对曹爽与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矛盾激化,他们像许多不愿卷入其中的士人一样,相继从政界退出,回乡隐居。关于山涛与阮籍的隐退过程,史书有明确记载。正始八年,任河南从事一职的山涛因洛阳的政治形势而焦虑得夜不能寐,“投传而去。未二年,果有曹爽之事,遂隐身不交世事。”(《晋书》卷四十三《山涛传》)

 从正始八年前后山涛退出洛阳回到河内,到景元三年嵇康被杀,竹林之游持续了十五年左右。竹林之游可划为前期(247—256)和后期(259——262)。前期的核心人物是嵇康、阮籍、山涛,特点是避开洛阳的政治旋涡;后期,核心人物是嵇康、吕安、向秀,特点是消极抵制司马氏的“名教之治”。前期的活动区域在河内郡治所怀县城(妙乐寺塔下)及山涛家乡西小虹,后期在云台山百家岩。

 嵇康拒绝山涛举荐的那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让山涛在历史上颇为被动,其实不然。

 山涛与嵇康,家世不同,选择自然迥异。山涛的重祖姑,是司马懿的太太张春花。西晋政治斗争频发,一到要站队的时候山涛便投向了司马家,不久便官居尚书吏部郎。《晋书?山涛传》载:山涛“居选职十有余年,每一官缺,辄自拟数人,诏旨有所向,然后显奏,随帝意所欲为先。故帝之所用,或非举首,众情不察,以涛轻重任意。或譖之于帝,故帝手诏戒涛曰:‘夫用人惟才,不遗疏远单贱,天下便化矣。’”而涛行之自若,一年之后众情乃寝。涛所奏甄拔人物,各为题目,时称山公启事。”后世称颂也多在此。

 山涛比嵇康年长,又很爱嵇康的才华,加之司马家又想笼络天下才俊,嵇康是首选人物,因此,才有了举荐嵇康出任吏部这出戏。于是,公是为延揽人才;于私,是为救好友一命。山涛尽管可以向别人勾手指头,对嵇康则可谓关怀备至。嵇康的绝交书,实在是辜负了山涛一派心意。但从政治斗争的角度考虑,这对

绝交书,割断了他与山涛的关系,又未始不是对山涛的保护。后嵇康无论做什么,山涛都不至于再受牵连了。直到要砍脑袋了,嵇康才对儿子嵇绍说:巨源在,汝不孤矣。这话,近于托孤。可见,他是知道山涛的用心的。这样来看,嵇、山二人的关系,或许应当有一种新的解释呢。

 山涛是做了大官的,也很会做官。他人主吏部荐举了不少有用之才,但对皇上的旨意也从从不违拗。他竭力帮助司马家网罗人才,但对昔日之朋友仍肯尽心尽力。山涛从不受他人礼物,他任吏部尚书时,前来请托送礼的人络绎不绝,但无一不被他回绝。山东陈郡县令袁毅趁山涛不在家,偷偷给山涛家送去百余斤真丝,山涛回家后,一时无可奈何,只得令家人将这些真丝悬挂于梁上而不用。后来,袁毅劣迹败露,朝廷得知他曾送真丝给山涛,派人查询,只见那百余斤真丝仍悬于梁上,虽已为虫蛀食,但尘埃封印如故。众人不禁钦佩山涛的为官清廉,称他为“悬丝尚书”,山涛死后,皇帝赐朝服一具,衣一袭,钱五十万,布百匹,以供丧事,并策赠司破。巴皇上钦差左长史范略前往家中探望,只见山涛家中房屋破败,居住拥挤。范略甚是感动,回禀朝廷,皇上也为之动容,降旨为山涛家人兴建房舍。看来他是一个颇为老练,圆滑但又忠肝义胆,善处各种关系的官僚。

 山涛墓和山涛祠在其故里武陟大虹桥乡西小虹村,原墓、祠并峙,以山涛墓为主,加上其父山曜,儿子山简等12座墓组成山涛墓群。可惜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毁。祠内现存纪念山涛的明、清碑刻数十通。

 2、向秀(约227—272)。关于向秀的籍贯,各种史书的记载没有疑义,“向秀字子期,河内怀人也”(《晋书》卷四十九《向秀传》,中华书局,1974年版,第1374页)。1931年《续武陟县志》载向秀墓:“在尚村,相传尚村原名向村,即向秀故里。”河内怀县,即武陟县。现武陟县三阳乡尚村尚存有向秀家。向秀是竹林七贤之一,但其声望却不能与嵇康同日而语。他平平淡淡地活着,无声无息地死去,甚至没有完整的文集传世。尤其是《世说新语》关于嵇康打铁时向秀烧火的描写,绘声绘色,使他以“小伙伴”形象留在历史的记忆中。这无疑是一个绝大的误会。无论从中国思想史还是文学史上看,向秀绝不亚于家喻户晓的嵇康,是少有的大哲人、大文家。所著一赋、一论、一书三种作品, 均是世论之作——其《思旧赋》堪称千古绝唱, 魏晋时期无赋与之比肩;《难养生论》匠心独运,与嵇康难分高下;而更重要的, 是其《庄子注》,开创玄学《庄》新思路。在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发展史上,向秀经历了正始、魏末和晋初三个文化时代。确切地说,他一直处于政治、文化变革的思想前沿。

 在混迹于西晋官廷的日子里,向秀对《庄子·逍遥游》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,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。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,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——“逍遥”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,而逍遥仅是本性的满足,如果满足了自我的本,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别的,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,睡着后的感觉是一样。从这个角度看,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,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,即使圣人与凡人,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,向秀将这一发现上升为“性分”学说,刷新了思想界对“逍遥”的理解,融铸在其《庄子注》中。

 向秀注《庄子》,吕安读后惊叹道:“庄周不死矣!”后才被郭象剿,成了“郭注”。那时没有著作权法,向秀的后人也不可能懂得保护知识产权,时至今日,“向注”只存片言只语,“郭注”却仍风行于世。但向秀的理论贡献并没被抹杀,思想哲学大家侯外庐、汤用彤、王敦毅等在著述中都肯定了对向秀的成就,毛泽东读《晋书·郭象传》,批道:“郭象无行”,讲的是公道话。

 向秀确是这个时代杰出的人才,他的《庄子注》可算玄学中第一等名作。他从根本上去调和孔老(或儒道)两家的思想冲突,取消“自然”与“名教”的对立,向这种用意,反映在他的《庄子注》中。谢灵运在《辨宗论》上有句话,说“向子期(秀)以儒道为一”,指的是向秀。

 向注《庄子》也受到佛学理论的影响,比如他提出的“自生独化论”。这种宇宙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所没有的,却是般若经反复阐述的基木观点之一。还有,向秀《庄子注》中还有一些语录与佛理相近。例如,向秀关于“无极”的论述虽然与“涅槃”不可同日而语,但也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。向秀的理论是否直接来自妙乐寺,值得研究。

 《世说》载向子期举郡计人洛,文王引进问曰:“闻君有箕山之志,何以在此?”对曰:“巢、许诤介之士,不足多慕。”有人说,这是向秀的“投降”、“转向”,我们认为,这是在实践他的思想理论,是个殉道者。

四、帛法祖——一个籍属武陟的佛界大德高僧

 帛法祖是魏晋河内人,著名高僧,是当时佛教界十大高僧之一,有多部佛经译著,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扬作出重大贡献。帛法祖与竹林七贤属于同一时代。但是,确定帛法祖身份的两个重要因素——出生年月和准确出生地,佛教界和学术界至今都没有弄明白,实在是一大遗憾,更令人不解的是,一些刊文和引用者自作主张,想当然将“河内人”注解为“今沁阳人”,实在是对历史的误读。

 要回答帛法祖是哪里人,首先要论证他的出生年月,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公元266年,河内郡治所从怀城(今武陟县)迁往野王(今沁阳市)。若帛法祖生于此前,则其出生地很可能就在怀城附近;若生于后,则于野王附近也有可能。我们先来看一段史料记述——

 《高僧传》卷一·帛远(晋长安):帛远字法祖。本姓万氏。河内人。父威达。以儒雅知名。州府辟命皆不赴。祖少发道心。启父出家。辞理切至。父不能夺。遂改服从道。祖才思俊彻敏绝伦。诵经日八九千言。研味方等妙人幽微。世俗谈素多该覆。乃于长安造筑精舍。以讲习为业白黑宗禀凡且千人。晋惠之末。太宰河内王颍川献中。虚心敬重。待以师友之敬。每至闲辰净夜。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初建后且甚盛。能言之士。咸服其远达。祖见群雄交争干戈方始。志欲潜遁陇右以保雅操。会张辅为秦州刺史镇陇上祖与之俱行。辅以祖名德显著众望所归,欲令反服为己僚佐。祖祖志不移,由是结憾。先有州人管蕃与祖论议屡屈于祖。蕃深衔耻恨每加谗构。祖行至开县。忽语道人及弟子云。我数日对当至。便辞别。作素书分布经像及资财都讫。明晨诣辅共语。忽作辅意。谓收之行罚。众咸怪怖。祖曰。我前来此毕对。此宿命久结非今事也。乃呼十方佛。祖前身罪缘欢喜毕对。愿从此以后与辅为善知识。无令受杀人之罪。遂便鞭之五十。奄然命终。辅后具闻其事方大愧恨。初祖道化之声被于关陇。峭鹗之右幸若神。戎晋嗟呀行路流涕。陇上羌胡率精骑五千。将欲迎祖西归。中路闻其遇害。悲恨不及。众咸愤激。欲复祖之讎。辅遭羊阮雪。胡率轻骑逆战。时天水故张下督富整。遂因忿斩辅。群胡既雪怨耻。称善而还。共分祖尸各起塔庙。……孙绰遵贤论以法祖匹嵇康。论云。帛祖衅起于管蕃。中散祸作于钟会。二贤并以俊达之公。昧其图身之失。栖心外事外经世招患。殆不异也。其见称如此。祖既博涉多闻。善通梵汉之语。尝译惟摩弟子本五部僧等

三部经。又注首楞严经。又有别译数部小经。值乱零失不知其名。祖弟法祚。亦少有令誉。被博士征不就。年二十五出家。深洞佛理。关陇知名。时梁州刺史张光。以祚兄不肯反服辅之所杀。光又逼祚令罢道。祚执志坚贞以死为誓。遂为光所害。春秋五十而有七。注放光般若经。以讲论研习佛经为业。僧俗弟子约近千人。晋惠帝(公元290年—306年在位)末年,太宰河间王弼贡镇守关中,对法祖虚心敬重,待之以师徒之礼,每到闲辰净夜之时,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道德。当时群雄争斗,干戈四起,法祖就想潜迹于陇山以西地区,以保持自己正确的操行。正值张辅担任秦州刺史,镇守陇上,法祖就与张辅同行。因法祖的名望和德行,众望所归,张辅就想让法祖离教返俗,当他的僚佐。但是法祖信仰佛教的志向是不可改变的,因此两人结下怨恨。先前有个秦州人,名叫管蕃,因宗教信仰不同,多次与法祖辩论,却屡屡败在法祖手下,为此管蕃怨恨已久,多次在张辅面前进谗言,诬陷法祖。当法祖走到开县时,忽然对其他的和尚和弟子们说:“几天之内,我的前世之对就要来了。”于是辞别众人,并写了一封书信,交给经书、佛像和资财都分给众人。第二天早上,法祖来到张辅这里,和张辅谈话,二人话不投机,得罪了张辅,张辅将法祖抓起来,要实行刑罚,众人都很奇怪,也很惋惜。法祖说:“找来此是为了了结我的前世之对,这是前世宿命所造成的,但是为现在的事情。”说完大呼十方佛祖:“我前世的罪孽因缘,今世欢喜了结,望从此以后,找与张辅之间没有任何怨恨,结为朋友,也不要让他戴上杀人的罪名。”随后张辅鞭打法祖50,奄然命终。后来张辅知道了法祖临死前说的这一番话,感到非常遗憾。当初,法祖传布教化的声誉,传遍了整个关中、陇西地区,人们将法祖奉若神明,听说法祖被害的消息,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,都悲痛异常,走在路上都痛哭流涕。陇西的羌族及其他民族,派出5000精锐骑兵,准备迎接法祖的到来,走到半路,听到法祖遇害的消息,悲恨万分,群情激愤,发誓要为法祖报仇。张辅听到这消息后,立即遣兵拒敌,羌族人率领轻骑,奔袭迎战。当时天水人富整,趁势杀了张辅,羌族人感到大机已背,便退兵了,他们将法祖分尸,各自带回去起造佛塔或佛所。……后来东晋文人孙绰在《道贤论》中将法祖与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相比,可见后人是多么推崇法祖。法祖还博涉闲书,精通梵语和汉语,他曾翻译了《惟逮》、《弟子本》《五部僧》等3部经书,又注释《首楞严经》,还翻译了几部小经,但正值社会动乱,都散失了,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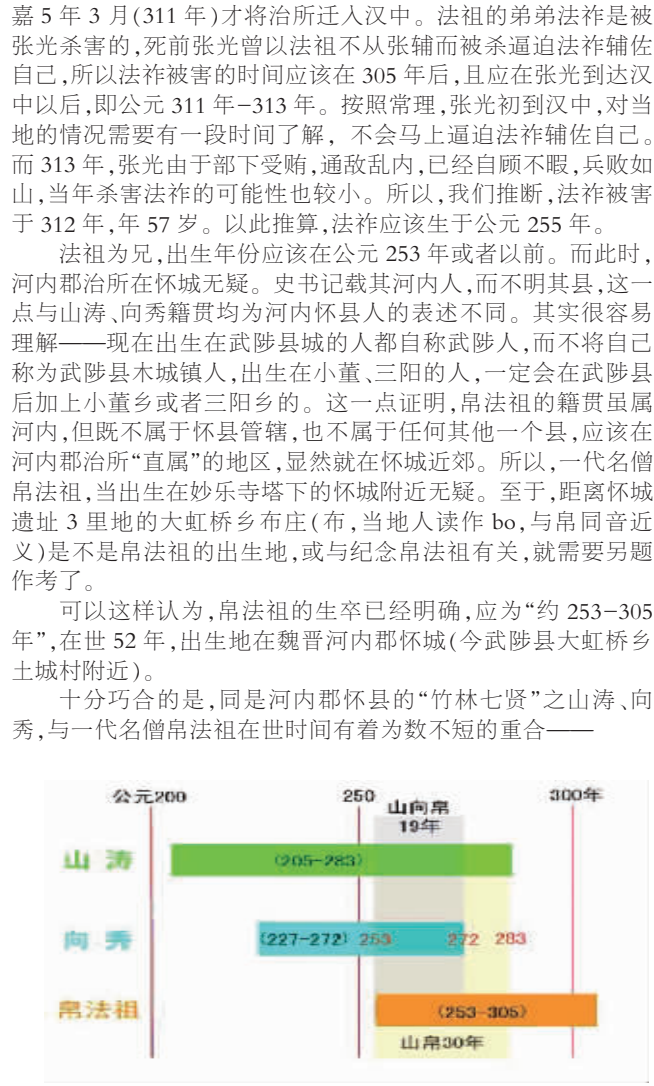
 法祖的弟弟法祚,也是在少年时就有美好的声誉,被朝廷征召为博士,但法祚没有去就任,到25岁时出家为僧。法祚对佛教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研究,在关中、陇右一带很有名望。当时的梁州刺史张光,用法祖不肯还俗,被张辅杀害,逼法祚还俗辅佐他,法祚坚持自己的志向,决不改变,并以死为誓,结果被张光杀害,终年57岁。法祚生前注译《放光般若经》,并著《显宗论》等。这段记载给出了帛法祖生前的全部信息——

 张辅(?—305年),晋末秦州刺史。史载,永兴二年(305年),张辅升任秦州刺史。自此可以断定,法祖是在公元305年离开长安,与张辅一道进入甘肅的。同年,张辅于遮多谷口与韩朴大战,但被击败,最终被封尚旧将富整所杀。而在西行途中,法祖因拒绝张辅让他辅佐自己,此前已经被杀下令杀害。 张光(259—313年)。公元307年领命任梁州刺史,辗转一年有余,308年到任,先是将治所安置在新城(今湖北房县),到永嘉5年3月(311年)才将治所迁入汉中。法祖的弟弟法祚是被张光杀害的,生前张光曾以法祖从不张辅而被杀逼还俗辅佐自己,所以法祚被害的时间应该在305年后,且应在张光到达汉中以后,即公元311—313年。按照常理,张光初到汉中,对当地的情况需要有一段时了解,不会马上逼迫法祚辅佐自己。而313年,张光由于部下受贿,通敌乱内,已经自顾不暇,兵败如山,当年杀害法祚的可能性也较小。所以,我们推断,法祚被害于312年,年57岁。 以此推算,法祚应诞生于公元255年。

 法祖为兄,出生年份应该在公元253年或者以前。而此时,河内郡治所在怀城无疑。书记载其河内人,而不明其县,这一点与山涛、向秀籍贯均为河内怀县人的表述不同。其实很容易理解——现在出生在武陟县城的人都自称武陟人,而不将自己称为武陟县木城镇人,出生在小董、三阳的人,一定会在武陟县后加上小董乡或者三阳乡的。这一点印证,帛法祖的籍贯属属河内,但既不属于怀县管辖,也不属于任何其他一个县,应该在河内郡治所“直属”的地区,显然就在怀城近郊。所以,一代名僧帛法祖,当出生在妙乐寺塔下的怀城附近无疑。至于,距离怀城遗址3里地的大虹桥乡布庄(布,当地人读作bo,与帛同音近义)是不是帛法祖的出生地,或与纪念帛法祖有关,就需要另题作考了。

 可以这样认为,帛法祖的生卒已经明确,应为“约253—305年”,在世52年,出生地在魏晋河内郡怀城(今武陟县大虹桥乡土城村附近)。

 十分巧合的是,同是河内郡怀县的“竹林七贤”之山涛、向秀,与一代名僧帛法祖在世时间有着为数不短的重合——



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,在帛法祖19岁前,向秀在世,30岁前山涛在世,帛法祖十三岁时,河内郡治迁往野王,但妙乐寺是不会随意迁动的。另从其弟法祚“年二十出家”可断,当时俗人出家的年龄不会太小,再说其家境也应该是过得去,研佛可以,出家就是一些什么随便的事情了,纵使出家,妙乐寺当是比较好的去处。而“父威达,以儒雅知名,州府辟命皆不赴。”,这个“州府”也当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怀城。帛法祖“少发道心。才思俊彻敏绝伦。诵经日八九千言。研味方等妙人幽微。世俗谈素多该覆。”可见,帛法祖在离开家乡前往长安时,已经是名望和成就都很高的僧人了,年龄也不会太小。

 这样的父子才俊,又是老乡,作为专为司马朝网络人才“组织部长”,山公不可能不知道,也不可能不向朝廷举荐,山公与其论道说学更是自然。如前所述,东晋的孙绰曾把帛法祖比作嵇康,同样,他也把山涛比作西晋高僧竺法护“护公德居物表,巨源位登论道,二公风德高远,足为流辈矣。”(《高僧传·卷一》)

 所以说,帛法祖走上佛学的道路并取得如此成就,除了在妙乐寺研读梵文佛经外,不可能不受到七贤思想的影响,离开家乡前往长安前,不可能与七贤没有思想交锋和观点的探讨。

 同一个县,同一时代,就在妙乐寺周围方圆十来里地里,同时产生了3位对中国思想史的演变和重建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,这是巧合,还是必然呢? (未完,下期刊发《妙乐时空》<下>)



文化探源